

樹新義室學記

黃永年的生平和學術

陸三強 主編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树新义室学记

黄永年的生平和学术

陆三强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ZH15N09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新义室学记：黄永年的生平和学术 / 陆三强主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5.10

ISBN 978-7-5613-8240-0

I. ①树… II. ①陆… III. ①黄永年(1925~2007)—纪念文集
IV. ①K82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2629号

树新义室学记：黄永年的生平和学术

陆三强 主编

选题策划 / 刘东风 郭永新

责任编辑 / 高歌

责任校对 / 郝宇变

装帧设计 / 屈昊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www.snupg.com

印刷 / 陕西天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2

插 页 / 4

字 数 / 280千

版 次 /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 1—2000册

书 号 / ISBN 978-7-5613-8240-0

定 价 / 42.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 85303879



黄永年



前排右起：毛双民、傅璇琮、史念海、黄永年、贾宪保；后排右起：赵望秦、胡宝华、孙永如、唐亦工、陆三强

回忆我和周绍良先生的交往

黄永年

已经过去的2005年，有两位比我年长的文化领域名贤逝世了，一位是大家知道的^启敬功先生，还有一位是周绍良先生。我是1925年出生的，绍良先生1917年出生，比我大8岁，但我们仍成为好朋友。

我认识绍良先生，是在1980年在西安成立唐史研究会——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唐史学会上。稍后因公进京，曾在绍良先生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的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法源寺等借住过。以后有公款可住招待所宾馆，仍必去找他谈今说古。他精于饮食，每次必请我上馆子。又能玩古籍版本，而且气量大，高兴时可以赠送真知笃好的朋友。他先是主动送我明万历三十七年，



黃永年篆刻

目 录

我的自述 / 黄永年	001
治学浅谈 / 黄永年	005
我读纪传体史书 / 黄永年	014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 / 黄永年	020
送别我的老师 / 辛德勇	034
一位大学者走了 / 刘九生	038
一个永远的遗憾 / 焦 杰	045
那渐行渐远的身影 / 李卫东	048
追忆黄永年先生 / 顾 青	052
由黄永年先生而想起的 / 沈 津	056
黄永年先生二三事 / 张伟然	062
怀念黄永年先生 / 吴 洋	067

在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 / 辛德勇	072
最后的孤傲 / 张懋镕	079
怀念黄永年先生 / 毛双民	082
史苑学步忆恩师 / 郭天祥	092
君子之儒 行而为教 / 周晓薇	099
记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 / 曹旅宁	107
以静为用，是以永年 / 陆三强	128
学人黄永年赠印 / 张寿平	136
黄永年审稿趣事 / 赖瑞和	138
黄永年先生与蟹壳黄 / 罗争鸣	141
随黄永年先生上海行琐忆 / 周晓薇	144
读《黄永年文史五讲》引起的遐想 / 张剑光	150
黄永年先生的治学三昧 / 郭绍林	154
黄永年先生与中古历史研究 / 张燕波	172
求真探微：黄永年先生的文史研究 / 郝润华	182
黄永年先生与古文献研究 / 辛德勇	190
黄永年先生的目录学思想述略 / 王培峰	199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思想述略 / 李永明	213
黄永年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 / 郝润华 杨旭东	224

可以永恒的传承 / 王其祎	237
评黄永年《唐代史事考释》等著作四种 / 张国刚	244
扶隐探微 发掘真相 / 孟彦弘	251
唐史研究的钥匙 / 陆三强	261
一本唐史入门的必备工具书 / 赵晓星 寇 甲	265
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 / 辛德勇	276
新世纪的《书目答问》 / 董运来	294
读《清代版本图录》 / 周振鹤	300
共续藏书纪事诗 / 贾二强	303
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 辛德勇	309
父亲黄永年的书趣 / 黄寿成	316
藏书家黄永年先生 / 陆三强	323
黄永年先生购书记 / 王勇忠 姜庆刚	327
黄永年先生简谱 / 张 萍 陆三强	332
黄永年先生著述简目 / 张 萍 陆三强	348
大师已去，再无先生（编后记） / 陆三强	370

我的自述

◎ 黄永年

我是江苏江阴人，一九二五年十月出生，一九五〇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一九五六年随迁校来西安，一九七八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一九八二年晋升为教授。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社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等。

我童年循例在常州上幼稚园、小学，并无所谓家学渊源。引导我进入学术之门的，是抗战初在沦陷了的常州地摊上买到的吕诚之（思勉）先生所著《经子解题》。接着在武进县立初中读书时找些古书自己看，学作文言文也过了关。高中上了不到半年的苏州中学沪校，二年级时考入设在常州郊区不属敌伪管辖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又有幸听了吕诚之师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以及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同时，从诚之师处得知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购读后深信三皇五帝、夏禹治水之非史实，并由此学得了精密的考证方法。接着又认识了与诚之师同编《古史

辨》第七册的童丕绳（书业）先生。抗战胜利后又认识了顾颉刚先生，成为他们的学生。至于研究唐代文史，则在放弃了胜利前中央大学南京部分的学籍重新考入复旦大学之后，其时买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我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但我又不盲目崇拜权威，在当时发表的文章里，就有对陈先生《狐臭与胡臭》做商榷的。新中国成立后所写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也否定陈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

一九五〇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服从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一九五六年升为讲师，随迁校来西安。第二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反被错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这时想，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不许阿Q革命就重理旧业，写了研究唐两税法 and 考释常田、部田的文章，尽管明知无发表之可能。

一九七八年九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一九七九年元月右派旧案平反改正。一九八一年任副教授，一九八二年任教授。工作单位先在历史系，继在唐史研究所。一九八三年学校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副所长，一九八七年任所长，现已退休。此外，一九八三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任委员，一九九二年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今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一九九四年受聘为《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顾问，二〇〇〇年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二〇〇四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二〇〇五年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转入了顺境，就得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把教学和科研赶上去。教学上，自一九七九年起我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

一九八二年起又奉部命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政治部分）、隋唐史专题（经济文化部分）等课程。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其中撰成教材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

科研上，前十年把重点放在唐代政治史上，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政局、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近十年则转移到唐以前的北齐、北周到隋这一段，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而被视为夷狄，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立异同之处。至于古典文学方面，则写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长恨歌〉新解》等文字，并发现了仅存的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点校了《西游证道书》并考知《西游记》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考知《西洋记》金碧峰的本来面目。

以上这些成果都已写成论文公之于世。其中唐代部分包括前此讲河北藩镇、安禄山和两税法的已由执教美国的友人汪荣祖教授代为编集成《唐代史事考释》，一九九八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我又重编了一册包括齐周隋唐及其他文字的自选集《文史探微》，由中华书局于二〇〇〇年版行，同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还

出版了我的《树新义室笔谈》，则是将论文改写成的学术笔记。二〇〇一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学苑零拾》，则多是论文以外的零星篇章。又编订了《文史存稿》，由三秦出版社于二〇〇四年出版，还撰写了一部题为《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专著，把我研究的我国中古史事从理论上做了一次总结，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二〇〇四年出版。

我的成就只有如上这一些，实不够资格谈什么治学格言。一定要说，只有之前讲过的“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而过于在名和利上计较实无多大意义。再是研究历史主要得把史实弄清楚，在此基础上能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自更好，而哗众取宠或卖弄求荣者终将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此文写于二〇〇五年）

治学浅谈

◎ 黄永年

《文史知识》要我给“治学之道”写文章。我想既称“治学之道”，就得讲大道理，讲大道理至少要把我大半辈子的事情好好总结，目前实在挤不出时间。何况即使挤了时间，可谈不出大道理来也够丢脸。不如老老实实叫“浅谈”。谈得对的地方来句套话“可供参考”，不对则尽可付之一笑。无非浪费点纸张油墨和印刷工人同志的精力，尚不致构成大过失。

过去有所谓“家学渊源”和“学有师承”的说法。“家学渊源”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先父早年去世，先母终生执教小学，并未从事学术研究。“学有师承”倒诚有其事，我的几位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还有先是老师、后来成为岳父的童丕绳（书业）先生，都是海内外公认的第一流学者或曰学术权威。不过他们都不是我上大学才认识的老师，成为我的老师都在上大学之前。所以要讲这个“学有师承”，不能不从我当小朋友时说起。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我出生在江苏常州城里，从幼稚园、小学、初中一直接受新式的教育。开始接触古代的东西，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避难到江阴农村读了半部《孟子》。一九三九

年春天回到常州城里重上初中一年级，很偶然地从地摊上买到一本吕诚之先生的《经子解题》，这本在今天看来仍是研究先秦古籍的好读物，那时候就成了我涉足学术园地的启蒙书。一九四一年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原先在上海光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的吕诚之先生回到故乡常州，第二年应聘到设在郊区不受敌伪管辖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任教，我得到消息就转学该校，在高中二年级时听到吕先生讲的四门课——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真可谓三生有幸！回忆起来，这一学年的收获远超过我以后上大学，开了眼界，掌握了读书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说为我今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

也在这个时候知道了童丕绳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童丕绳先生的大名是从吕先生那里知道的。知道吕先生和这位童先生合编了《古史辨》的第七册。本来我已知道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但总认为顾先生要推翻三皇五帝是旁门左道之言。这时出于对吕先生的敬佩心情，托人从上海代购《古史辨》第七册寄来，边读边思想斗争，大约斗了一星期光景，终于承认顾先生是正确的，我迷恋三皇五帝是封建传统在作怪。以后我和童先生见了面，抗战胜利后又经童先生介绍认识了顾先生，我都称他们为老师，他们也都认我为学生（其实童先生本是顾先生的学生，但我也并未称顾先生为太老师，当时好像并不计较这类辈分）。尽管以后我并未跟着他们以先秦史为专业，但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对中国古史的基本看法，尤其是他们精密不苟的考证方法，使我终身得益，受用无穷。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我就读于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和龙榆生（沐勋）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但未能传他的诗词之学。一九四六年重读上海复旦大学，蒋秉南（天枢）先生和我的师生感

情也很深，中文系主任陈子展先生在我的国文入学试卷上打了一百分，也使我有知遇之感，但我仍没有继承他们的学问。这时期对我真有影响的是始终不曾见过面的陈寅恪先生。我在复旦一年级时购读了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我跳出《资治通鉴》的老框框，看到了一片大可开垦的新土地，近十多年来我研究唐代政治史，实是受了陈先生的启发。

从以上的事实，可看到我之所以走上研究古代文史的道路，是受了这几位先生的启发和诱导，并不是像某些人怕学不好理科才学文科。不怕读者笑我吹牛，我上中学时数学还是拔尖的，曾经发现并纠正过当时流行的教材《三S平面几何》中某个例题的错误。后来之所以没有学理工，实在是这几位先生吸引力太大的缘故。

但我现在研究的、讲授的东西又绝大多数和这几位先生不一样。顾先生、童先生重点在先秦，我的重点在隋唐；童先生同时研究绘画、瓷器，我则研究版本、碑刻和书法；龙榆生先生研究诗词，我研究古小说和话本章回小说；只有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相重，但看法不完全相同。所以如此，一则怕闲人说我的成果是偷老师的，偷岳父的，另找一个领域便无此嫌疑；再则学生学老师主要是学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最多学一点基本原理，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在老师的领域内打转转，否则学术怎样能向前发展？

二

研究古代文史必须读古书，在这方面古人比我们占优势。像清代乾嘉学派的学人，他们从小读的就是四书五经，以后在此基础上研究经学、文字训诂、先秦诸子之类自是驾轻就熟。就连我的岳父童丕绳先生也从小专门请了老师教古书，十三经多半能背诵。到